

宿業流傳：晚明制藝文化與 時文序的文類膨脹*

龔宗傑

提 要

明代萬曆朝以降，圍繞八股文之寫作、編輯、出版、批評等文學活動及結社、應酬等士人行爲共同構築而風行一時的“制藝文化”，成爲一股塑造晚明文學與士人思想生活的重要力量。與時文選集、編刊相伴而生的“時文序”，既是古代文體學因應這一文化現象所作出的反應，也是晚明文學景觀中的獨特風貌。隨着“序制舉業”這一文人行爲的流行，時文序不僅作爲序之一體進入文人別集、文章總集的編輯序列中，更藉助晚明時文名家的效應不斷擴大影響。刻文撰序的普遍化又催生出自編時文集、自題時文序等現象，也促使時文序顯示出“自表生平”的敘事功能，而成爲晚明士人回憶和記錄科舉生涯的文本載體。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時文序自晚明以降的文類膨脹，最終引發清人對於時文序入集之合理性的反思。

關鍵詞：時文序 制藝文化 文類膨脹 馮夢禎 趙維寰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人集部著述與明代文章學研究”（項目編號24BZW062）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明中葉以來文壇的復古運動及思想界的心學思潮皆對明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而自萬曆以降，由科舉考試及相關諸環節形成的“制藝文化”，則是一股不應被忽視的塑造晚明文學與士人思想生活的力量。關於明代科舉，學界近年的研究趨勢已從制度史向出版史、文化史過渡，¹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學者對科考文體、制藝名家和時文選刻的關注。²但在總體上，有關制藝與晚明文學的研究在已獲探討的八股文的文學性、古文與時文之關係等話題之外，仍有許多方面有待梳理或重新認識。本文所用的“制藝文化”，主要指尤其自晚明以來流行於廣大士人群體之中，圍繞制藝八股文之寫作、編集、出版、批評等文學活動及結社、習文、應酬等士人行爲所產生的文化現象，例如文人士子或爲謀求聲價、或爲記錄生平而自編自序時文等此時期所特有的行爲，直至清代，乾嘉時期文人王芑孫也有自編時文之舉，並自題序以述編集緣由：

山人於制舉文，講之頗久而爲之頗少。山人試於時二十年，未嘗一得當，人故不以制舉文推山人，山人亦不以制舉文自名，以其嘗耗日力於此也，又以世宿其業，流傳之有緒也。聊欲稍存一二，以貽後之君子。於是裁取八十篇，錄石執如、秦凌滄二君子之序冠於編，而題之曰《淵雅堂制義》。古人一書不兩序，二君作序，相去蓋十年矣，所序之文非一編，今

1 相關成果參看本傑明·艾爾曼著，高遠致、夏麗麗譯：《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頁380—430；周啓榮著，張志強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134—215。

2 有關經義文體在晚明發展的討論，可參看龔宗傑：《集部視野下明代經義的文體建設及文章學意義》，《復旦學報》2021年第5期，頁117—125；張藝曦以湯賓尹爲例探析了晚明“制藝風潮”中時文名家在士人群體中的文化影響力。參看張藝曦：《湯賓尹與晚明制藝八股文的流行及傳說》，《漢學研究》第40卷第1期（2022年3月），頁77—226。針對時文選家與選刻的出版文化研究，可參看王煒《明代八股文選家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1—191；徐兆安：《“房稿”刊行的習慣與晚明時文評選風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5本第1分（2024年3月），頁113—161。

乃合而錄之，故序亦合也。³

王芑孫在自白中提到的“耗日力於此”及“世宿其業”“流傳有緒”，可謂明清士子的普遍心聲，頗能說明此種制藝文化持續作用於明清廣大士人群體的影響力。與一定程度上更強調制度屬性而為學界習用的“科舉文化”略有不同，本文使用“制藝文化”旨在考察圍繞科舉時文所展開的編刊、選評等現象，更看重其文學文化或曰藝文之屬性，這或許更有助於我們觀看這股文化風氣瀰漫之下的晚明文學圖景。

明人研討制藝的風氣抑或是他們自稱的“制藝之學”，⁴在萬曆年間迎來興盛期且一直延續至清代。對此，現有文獻反映出一個較直觀的現象是：自明初以來士人論文談藝主要圍繞詩歌、古文辭展開，科考制藝常為藝林所不齒；但至嘉靖、萬曆年間，制藝八股則多與古文辭並舉，這一點在此時期諸多序文中頗為多見，例如李維楨序董復亨集說：“董元仲自少善古文辭，其為舉子業，亦以古文辭緣飾之。”⁵李光縉序許獬集亦稱其“制舉義出，方內奉之為泰山北斗，獨古文詞不少概見”，⁶其他序中另有“文至秦漢後亦屢變矣，詩與文二，古文辭與經義文又二”，⁷及“自經義興而古文詞衰”⁸等表述。在上引幾條材料中，羅萬藻《鮑邑侯制藝序》和吳之甲《汪魯生麟義序》二文比較特殊，它們不同於一般的詩文集序，屬於時文集之序，明清文人多冠之以“時文序”“時藝序”“制藝序”或“制義序”之名。從文體學史上來說，時文序在萬曆時期開始湧現且不斷延續，可以稱得上是應和晚明制藝文化而風行天下的新興文類，並且因

3 王芑孫：《制義自序》，《惕甫未定稿》，卷2，《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442，頁282。

4 羅萬藻：《鮑邑侯制藝序》，《此觀堂集》，卷1，《明別集叢刊》（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第五輯，冊90，頁148。按，序文題名原作《鮑邑侯藝制序》，據原書卷首目錄改。

5 李維楨：《董元仲集序》，董復亨：《繁露園集》，卷首，《明別集叢刊》，第五輯，冊13，頁393。

6 李光縉：《許鍾斗文集序》，《景璧集》，卷五，《明別集叢刊》，第四輯，冊21，頁210。

7 胡承謨：《石簣先生文集序》，陶望齡撰，李富會編校：《陶望齡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附錄，頁1400。

8 吳之甲：《汪魯生麟義序》，《靜悱集》卷七，《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冊78，頁298。

晚明制藝文社的活躍、時文集編刊的繁盛而呈現出一種膨脹式的發展態勢，塑造出晚明文學與文化景觀中的獨特風貌，以至於引發清人對時文序入集之合理性的反思。

對時文序這一文類，商衍鎰較早留意到黃宗羲《明文海》“內載時文序七十八首”，⁹但他並未對時文序作出合理的文類判斷，將之列為私人所選之八股文。張思齊整理的《八股文總論八種》，於“明人論八股之二”選錄了《明文海》中的部分時文序，但從所附之“《明文海》解題”來看，整理者似仍沿襲了視時文序為時文的文類誤讀。¹⁰近年隨着明清科舉學、文體學研究的進展，晚明以來大量的時文序也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關注，¹¹不過目前的研究集中於批評意義的抉示上，較易忽略它們發生、發展的文類語境。本文嘗試以盛行於晚明的制藝文化為視角，對時文序的文類膨脹現象及其意義展開多維度的思考。

二、“序制舉業”之流行與時文序入集

在黃宗羲編纂的卷帙浩繁的《明文海》中，序是佔據四分之一卷數的大型文類，並被細分為著述、文集、詩集、贈序、送序、雜序、序事、時文、圖畫、技術、壽序、哀輓、方外、列女等十四個子類。其中所收時文序共七卷八十餘篇，多為晚明文家所撰，最早的一篇是嘉靖間文人劉繪的《醒泉窗稿序》。這篇序文的對象是黃尚質（號醒泉）任息縣（今屬河南）縣令期間，為指導縣中諸生習文應舉而編選的窗稿經義選本，故序中強調舉業作為藝文之一種有其專門之屬性，如說“今舉業首經書義，固藝文之精奧焉，括綜經旨，浸漬聖術，搜體遺緒，摛衍微響，非若辭賦歌詩，猶可以騁浮艷，侈枝葉也”，¹²意在突出編選窗稿這一行為所

9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頁246。

10 張思齊整理：《八股文總論八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00—302。

11 文獻整理成果如《八股文話》下編“雜著”之第二部分“八股文選本及有關著述的序、跋、凡例”，選錄部分明清時期八股文選本中時文序，見龔篤清、龔昊、烏媛編著：《八股文話》（長沙：岳麓書社，2020年），頁2885—3055。研究成果有張帆、陳文新：《論〈明文海〉中的八股文批評》，《人文論叢》2017年第2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54—259。

12 劉繪：《醒泉窗稿序》，黃宗羲纂輯，黃靈庚、慈波點校：《明文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卷307，頁6469。

具有的指點迷津的授學價值。

嘉靖以前的時文序數量不多，並且大體上有著與《醒泉窗稿序》相近的書寫特徵，可以概括為：多與“半官方”性質的時文集編纂相伴，以彰顯編集的習文示範性為寫作主旨。此處所說的“半官方”，相對於作為官方文件的鄉、會試錄和晚明大量自編、他編的非官方的時文集而言。與前者相應的鄉、會試錄序，規定由各科考官撰寫；與後者有關的時文序則多出自文人的個人創作。黃尚質作為地方官編選的訓士讀本則介乎兩者之間。嘉靖以前與之相近的時文選本是蔡清的《精選程文》，同樣為指導鄉里士子習舉業而編：“予釋褐時，鄉子弟有從予請業是者，予弗暇也。乃為選取四書程文中之優等者數十篇，略加批點，以指示之，使其不至於純乎架屋疊床，浮花浪蕊之習也，其亦進於古之一階乎？”¹³蔡清後於正德元年（1506）任江西提學副使時正式刊刻了這部時文選本，並為之作《刊精選程文序》：“乃今奉命視學江右，見士子之業是而不得其方者多，因檢出此，以為之式，諸生遂錄布諸梓，予適見之，為書此以道其故。尚欲遍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而時文悉趨於正，亦清今日分內一細事也。”¹⁴從中可看出蔡清在刻書作序背後作為學政的自我身份意識。

在蔡清《精選程文》刊行數十年後，其同鄉林希元在嘉靖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時曾重刊印行，並撰《重刊蔡虛齋先生批點四書程文序》，亦稱此書有裨於“式初學”及“正文體”。¹⁵約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後，林希元編選了《批點四書程文》以作為蔡清《精選程文》的接續之作，收錄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至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之會試程文，並撰序交代乃由書坊刊刻：“書林陸璣氏求壽之梓，以廣其傳，此予志也。乃令門人葉文山、陳光宇編次校正與之，以予所見序於篇首，俾學者知予意之所取捨云。”¹⁶林希元重刊蔡清《精選程文》也是交

13 蔡清：《刊精選程文序》，蔡清著，張吉昌、廖淵泉點校：《蔡文莊公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94。

14 同上。

15 林希元：《重刊蔡虛齋先生批點四書程文序》，《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冊75，頁564。

16 林希元：《批點四書程文序》，《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7，頁564。

由書坊建陽葉氏：

當路君子以予嘗刻此編，從予求之，以教子弟，而建陽葉氏如璧復從予求舊本刻之書肆。予喜曰：斯文未喪，其在斯乎？乃取舊日所藏之本，付葉氏刻之。¹⁷

縱觀明代時文選本的編刊發展歷程，便會發現，從弘治年蔡清之選到嘉靖間林希元的步武之作，正值書籍出版業在明代迅速發展的階段，在此期間，書坊對時文選本等舉業用書的編刊起著越發重要的推動作用。林希元另有時文序《春秋文會錄序》，述說其撰序之緣由：

徐子世望卒業南雍，率其友筮廷和輩十餘人爲《春秋》之會，得義若干篇。金陵趙氏見之，請刻以惠同志，請序於余。……《春秋》之學既難，故業是經者亦少，坊間傳刻諸經義無慮數種，是經獨闕焉寡見，學者無所於法。徐子獨會諸生而有是錄，可謂有功矣。¹⁸

這篇序的對象是徐楚（字世望，嘉靖十七年進士）締結文社而編纂的《春秋》義稿，金陵趙氏書坊在這部社稿的編集和徵序中亦起到一定作用。

除了商業出版外，《春秋文會錄序》反映的另一個推動時文序創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社在嘉靖、萬曆以來的活躍，助長了社藝、社稿等時文集編刊的風氣。例如萬曆間趙南星罷歸居家時曾組織“正心會”，並爲會中諸生編《正心會選文》《正心會房稿選》等選集，另有自編時文稿並撰《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如《正心會選文序》講述編刊與撰序之緣由：

余以讀書靜坐之暇，選近科時文以示諸生，聊據所見，搜羅非廣也，又非敢云九變復貫也。今之文盛矣，識超者或不合經義，詞勝者或遠於時制，

17 林希元：《重刊蔡虛齋先生批點四書程文序》，頁564。

18 林希元：《春秋文會錄序》，《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7，頁568。

余不敢取也。吳昌期令其子貞復刻之江南郡城，諸君子請先刻之，以便諸士誦習，而屬予爲序。¹⁹

葉向高也曾爲趙氏《正心會全稿》撰序，記述趙南星“里居三十年，澹然無所嗜好，獨好爲時義”，“先生所著論文諸款，尤爲洞切。柱史馬君奉命督畿學，欲梓以式士。余甚喜之”。²⁰ 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選刻時文及與此相伴的時文序撰寫之流行。

在上述書坊參與、文社活動以及文人編選時文集日益活躍的情形下，作爲某種意義上伴隨時文寫作與時文集編選而來的“副產品”，時文序在晚明自然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庶幾成爲可與傳統文類中的別集序相提並舉的類型。一方面，晚明文人撰寫時文序表露出“序制舉業”的文類意識，如陳勳爲同年周之龍的《丹赤山房制義》撰序：

不佞之獲與左卿稱兄弟誼也，則以業舉文偕舉南宮，故然。某間過從，左卿爲發櫝，出其古文詞若詩歌，殆數萬言。……今讀其《丹赤山房義》，有片語不中律程否？有一不抉發聖真，極其旨之所如否？詞賦、經義復相妨否？此非關兼才，原屬一法，顧學者不察耳。左卿諸文詞別有副梓，余所序制舉業也。聊拈此義，以發經士之覆。²¹

周之龍，字左卿，湖南湘潭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官刑部主事，有詩文集《熊南文集》十卷，陳勳這篇序則專爲周氏的時文集而作。

另一方面，與此種文類意識相應的，便是時文序作爲序之一體進入晚明文人別集的編選序列中，進而影響文集編纂中的序類格局。上引多篇序文即多出自各家文集中的序類，如前文提到的李光縉《景璧集》，其前七卷爲序類，卷

19 趙南星：《正心會選文序》，《趙忠毅公文集》，卷7，《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冊68，頁164—165。

20 葉向高：《正心會全稿序》，《蒼霞餘草》，卷6，《明別集叢刊》，第四輯，冊63，頁493—494。

21 陳勳：《丹赤山房制義序》，《陳元凱集》，卷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79，頁552—553。

一“贈序”，卷二至卷四“壽序”，卷五、卷六“文序”，卷七“制義序”。值得留意的例子還有姚希孟《響玉集》，該集專收序類文，卷首有姚氏友人馬世奇《響玉集序》，指出：“先生前刻《清閼》諸集，讀者已作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為古今文叙，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而題曰《響玉》。”²²這十一卷的“古今文叙”按分體編排：卷一“史序”，其中收錄“試錄序”，卷二至卷四“壽序”，卷五、卷六“贈序”，卷七至卷九前為“集序”，卷九後、卷十為“制義序”，卷之餘為“雜序”。可見制義序在姚希孟的序文集中已作為序類文的獨立分支。

另一個例子是方應祥的《青來閣初集》與《青來閣二集》。《初集》十卷，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分序文二卷、尺牘五卷、雜著二卷、祭文一卷，其中兩卷序文大半為時文序。《二集》十卷，刊刻於天啓四年(1624)，卷首艾南英序曰：“方孟旋先生《初集》既成之後六年，而易曦侯、鄭從周等，取其自戊午迄癸亥所積外著為《二集》行於世。顧《初集》冠以制舉藝，序先生者大都為制藝而發，於先生外著尚未之及。”²³其中所說“冠以制舉藝”，實際上即指冠於《初集》之首的時文序。至於《二集》之文類構成，如卷首李維楨序稱“余讀《集》十卷，尺牘最多，序諸為舉業者次之，雜體僅十之二”，²⁴仍以序文、尺牘、雜著為主，且其中所謂“序諸為舉業者”亦佔據較大分量。

隨著“序諸為舉業者”的日益普遍，在晚明編刊的諸多文集中，時文序獨立成類、獨立成卷的現象愈發多見。例如鍾惺的自編詩文集《隱秀軒集》，天啓二年(1622)沈春澤刻本以千字文為序編次，天集至月集為詩類，盈集至雲集為文類，分體編排。其中文類部分“炘”集為序類，其目次如下：

序一：書籍一

序二：詩文集一

序又二：詩文集二

22 馬世奇：《響玉集序》，姚希孟：《響玉集》，卷首，《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78，頁 415。

23 艾南英：《青來閣二集序》，方應祥：《青來閣二集》，卷首，《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8，頁 369。

24 李維楨：《青來閣二集叙》，同上，頁 373。

序三：時義一

序四：贈賀一

序又四：贈賀二

在這些序文中有一篇試錄序，即收錄在序一“書籍一”的《貴州鄉試錄後序》，可知在鍾惺《隱秀軒集》的文類編次中，時文序亦是區別於試錄序與詩文集序的單獨類型。此外，另有崇禎間刊刻的李日華《李太僕恬致堂集》，卷十一至卷十六為序類，時文序單獨成一卷；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刻的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三專錄時文序，且有四十四篇之多。崇禎間刊行的陳繼儒《晚香堂小品》亦採用類似的編排法，卷九至卷二十四收序、傳、碑、記、祭文、疏、題、跋、志林等文類，其中序類下細分“書序”“類序”“集序”“詩序”“時文序（附游序）”“賀序”“壽序”等小類。

從以上梳理不難想見，時文序這一類型至明末已蔚為大觀，這無疑構成黃宗羲編選《明文海》收錄時文序的重要背景。關於《明文海》收入時文序，前揭張帆、陳文新《論〈明文海〉中的八股文批評》等研究提出了八股文作為有明一代之代表文體在晚明頗受重視等解釋，這其中固然有一定關聯，但從上文的梳理來看，“序諸為舉業者”的流行以及時文序進入文人別集，甚至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體類型，應是《明文海》這類總集選錄時文序的直接原因。明末清初之際，另一部選錄時文序的總集是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該書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三百六十為序類，共八十卷，分經類、史類、文類、籍類、騷類、賦類、詩類、集類、奏議、政類、學類、圖類、志類、譜牒類、紀錄類、目錄類、試錄類、齒錄類、時藝類、詞曲類、自序類等子類，及俳體、律體、釋類、變體等諸體。其中試錄序、齒錄序、時藝序三類是與科舉相關的序文，時藝序二卷即為時文序之選輯。以上都構成我們認識時文序自晚明以來迅速發展膨脹的文獻印記。

三、名家效應與刻文請序的普遍化

儘管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與黃宗羲《明文海》均收錄明中葉以來的時文

序,但二書在作者選擇上有較大區別。簡言之,《文章辨體彙選》選錄馮夢禎、郭正域、湯顯祖、陳繼儒、賀燦然、陳懿典、陶望齡、袁宏道、湯賓尹、鍾惺等文家之作,更聚焦於晚明制藝名家。其中像馮夢禎、陶望齡、湯賓尹皆為會元,在當時科場有著很高的聲望和號召力。就時文選本而言,這些名家的試卷、習作顯然是編者重點的選取對象,如湯顯祖曾選錄湯賓尹、許癸二家之文而成《湯許二會元制義》,以作為教授其子湯開遠習文應舉之讀本,並撰序自稱隆慶年間“弱冠舉於鄉,頗引先正錢、王之法”,²⁵以嘉靖以前的時文大家錢福、王鏊為師法對象。錢、王之後,嘉靖年間又有唐順之、瞿景淳繼之而起,冠絕一時,時人以錢、王、唐、瞿合稱為時文四大家。此後,薛應旂又樹起高標,故亦有退錢進薛,以王、唐、瞿、薛為四大家之說。其中,有關嘉靖年間唐順之、薛應旂二家時文之選刻,刊於萬曆間的《戒庵老人漫筆》曾記載: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德憑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²⁶

唐順之(號荆川)於嘉靖八年(1529)中會元,六年後薛應旂(號方山)中會魁,據此按李詡的回憶,嘉靖前中期坊刻時文名家的選本尚不流行。但至萬曆年間,坊刻時文已是書籍出版之一大宗,故湯賓尹說“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²⁷

事實上,在晚明,除了名家選本通過坊刻獲得大幅流通之外,一般文人士子的試卷、窗稿、社草及日常課業也因此種制藝文化的勃興而進入編集、出版

25 湯顯祖:《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湯若士先生點閱湯許二會元制義》(明萬曆間刻本),卷首,頁1a。

26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頁344。

27 湯賓尹:《兩孫制義序》,《睡庵稿》,卷3,《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63,頁60。

的環節，共同形成如李詡所謂“滿目皆坊刻”的情形。其中應考之後進士人多有將社草、課業投贈名家請其作序的例子。在此情勢下，如前揭馮夢禎、湯顯祖、陶望齡、湯賓尹等文章名家則獲得了另一種身份，即時文集的序作者。例如鍾惺《劉生制義序》自言：“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予者。”²⁸湯顯祖《答張夢澤》自述曰：“間求文字者，多村翁寒儒小墓銘、時義序耳。”²⁹因此，通過文家所撰的時文序，實可窺探晚明更廣大士人群體編集邀序以獲取聲價或謀求提攜的運作模式。以下試以晚明藝文場域中頗具聲望的人物馮夢禎為例展開討論。

馮夢禎(1548—1606)，字開之，號具區，又號真實居士，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隆慶四年(1570)中舉，萬曆五年(1577)會試第一，選庶吉士。七年，因忤張居正而歸鄉。十年，返京，授翰林院編修。十一年，分較禮闈，所得多名士。後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門生故吏衆多，引領萬曆中後期浙江等地之時文風氣，為士林所重。馮夢禎所撰時文序主要收在《快雪堂集》卷三，共有四十四篇，現據此將馮氏創作時文序的情況略作梳理如下：

萬曆七年(1579)七月，方應選(字衆甫，萬曆元年舉人，十一年進士)刻經義六十首，馮夢禎為之撰《方衆甫制義引》。

十六年(1588)二月，馮夢禎自編經義稿《旬日聽雨草》成，撰《題旬日聽雨草》，授吳生付梓，並刻《許徹庵先生秦中訂士錄》《馮開之門人稿》以附《聽雨草》之後。又撰《題許徹庵先生秦中訂士錄》與《題門人稿》二序。《秦中訂士錄》為萬曆十五年偶得自許孚遠(號徹庵，德清人)之鄉里，有經義二十首；《門人稿》收入門人李日華(萬曆二十年進士)、戴灝(萬曆三十四年舉人)及衢州諸生之時文稿。三月，得同年楊起元(字貞復，萬曆五年進士)所寄經義十五首，請汪應選刊而行之，並撰《題楊貞復經義近草》。八月，為同鄉諸生項利賓(字于王，萬曆二十八年舉人)經義稿撰序，序云：“所為經義，甚有當於居士，而未

28 鍾惺：《劉生制義序》，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卷18，頁344。

29 湯顯祖：《答張夢澤》，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35，頁1365。

甚遇合，居士亟張之當事者，意旦暮脫穎，而善病，不果試。生作義以韻勝，濃淡合度，既當於居士，益自喜，將出其如干首公諸同業，以廣居士之好，而乞序焉。居士曰：可也。”³⁰是年秋，為同鄉賀燦然（字伯闇，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的制義文作序，時燦然仍為諸生攻舉子業，故序文云：“伯闇氣益奮，著作益雄富，歲課至數十百篇。戊子秋，出二帙，一經一書，示余曰‘即不售，當屬子序刻之’。余唯唯。”³¹是年馮夢禎又為徐可求（萬曆二十年進士）撰《徐生制義序》，為來顏叔（生平不詳，蕭山人）、趙世祿（字文叔，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來斯行（字道之，萬曆三十五年進士）三生時文稿撰《序三生草》。

十七年（1589）三月，項德楨（字廷堅，萬曆十四年進士）搜羅正德以前諸家試文窗課千餘首，成《皇明四書文紀》一書，馮夢禎為之撰《皇明四書文紀序》。

十八年（1590）中秋，為吳江（今江蘇蘇州）士人沈祖量時文集《安雅齋集》撰序，序文交代原委云：“吳江沈生祖量以‘安雅’名其齋，所集經生言，亦以‘安雅’當之。……祖量索余言引其端，面懇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乃以數語塞其請。”³²八月二十一日，撰《皇明文憲序》，《皇明文憲》為何世選（字用夫，生平不詳）所輯經義集，序稱：“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³³十月，為來顏叔歷試卷撰《序來顏叔歷試卷》；為沈匡濟（字方平，天啓二年進士）撰《題沈方平一月草》。陽羨（今江蘇宜興）諸生吳彥淳（字養之）時文稿刻成，為之撰《序吳養之時義》。

十九年（1591）七月，友人吳惟貞（字伯度）《尚書程文》刻成，為之撰《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十月，先後得黃汝亨（字貞父，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刻近稿二十首、近稿二編四十首，撰《讀黃貞父稿》《題黃貞父近稿二編》二文。

二十三年（1595）九月，作《序鄭元夫舉業近草》。是年秋，同年吳安國之子吳無競以經、書義各二十首投贈，為之作《序吳無競制義草》。

30 馮夢禎：《序項生經義》，《快雪堂集》，卷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64，頁80。

31 馮夢禎：《序賀伯闇制義》，同上，頁74。

32 馮夢禎：《皇明文憲序》，同上，頁78—79。

33 馮夢禎：《安雅齋集序》，同上，頁79。

二十四年(1596)秋,爲華亭(今上海松江)諸生袁非之撰《題袁非之制義》;太倉(今屬江蘇)士子徐文任選《詩經》程墨成一編,爲之撰《序徐生選葩經程墨》。冬,撰《題黃野王制義》。

二十五年(1597)春,讀楊起元《尚書》義數篇並撰《讀楊貞復尚書義》。冬,題金沙(今江蘇南通)士子王雲鵬(字六息)文稿曰《扶搖》而梓之,並撰《題王六息扶搖草》。

二十七年(1599)秋,里中諸生趙昌期、朱大啓、金九韶、項德弘經義稿成,爲撰《序四子採真錄》:“每成一義,必造余而請焉,曰:‘先生視之,得無瀆於真不?’雖才力不同而識趣頗合,久之,其文成帙,命傳之梓,而題曰《採真》。”³⁴冬,里中諸生李棟(字隆吉)時文集成,名之曰《豫章篇》而梓之,並爲之作《序李生豫章篇》。

二十八年(1600)十一月,爲友人周本音之子永年作《題周生永年十義》:“吾友周本音以初秋過湖上,即示余從子永年十義,乞評數語。余置之篋中數月,本音歸,途道攜李,徵前諾焉,余始及卒業。”³⁵

二十九年(1601)夏,張以誠(字君一,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時文集編成,爲之撰《序張君一制義草》;賀知訥(生平不詳)寄黃川社社草,爲之撰《題黃川社草》。黃川社爲知訥子賀焄及其他子侄所結八股文社。

三十一年(1603)六月,爲西安(今屬浙江衢州)方應祥(字孟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及同學諸生時文集《聽松集》撰序;爲張奇齡(字符九,萬曆三十一年舉人,後十上春官不第)窗稿作序。

三十二年(1604)閏九月,作《序葛萬悅時義》。《快雪堂日記》載甲辰閏九月二十一日,“別葛、石,日高而行。午前校《文選》,作《葛萬悅經義序》,又作經義二首、《送申甫之南安》詩一首。”³⁶

以上之所以通過“流水賬”的形式梳理馮夢禎的時文序創作,一方面是爲

34 馮夢禎:《序四子採真錄》,同上,頁84。

35 馮夢禎:《題周生永年十義》,同上,頁85。

36 馮夢禎撰,王啓元校注:《快雪堂日記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卷15,頁317—318。

了展示馮夢禎自萬曆十六年以來,也即他歸鄉居家及其後復起任職南京翰林院、國子監期間撰序的大致情形,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此展示晚明時文序發展的動向。按照序文之對象,馮夢禎時文序大致可分如下幾類:第一類是制藝名稿、程墨集序,如《皇明四書文紀序》《皇明文憲序》《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序徐生選葩經程墨》。這類序文的寫作,正如上引蔡清《刊精選程文序》所展現的,重心會落在對其舉業津梁價值的肯定上,如《序徐生選葩經程墨》說:“余嘗欲取程自萬曆初溯正始,墨自弘、德至今日,先四子,次五經,雜選之,加精焉,以爲後學式,懶未暇也,而徐生能以毛氏《詩》先鳴。”³⁷強調“以爲後學式”的選文意義。

第二類是士子之社草序、課業序,這是馮夢禎所撰時文序中數量最多的類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晚明時文寫作、編集呈現規模化的大趨勢下,參與各級科舉考試的士子群體編輯刻印自己課業習作,投予名家請序的普遍現象,這可以說是構成萬曆以來科舉話語分割、選權下移的主要因素。馮夢禎文集集中的《序項生經義》《徐生制義序》《序三生草》《序李生豫章篇》等文即是此類針對士子習作所撰序文,如爲方應祥及同學諸生時文稿所撰《題聽松集》:

西安方孟旋,其舉子業故奉辦香于余,群諸子之同臭味者,讀書雲居精舍。雲居有松數千章,故中峰禪師手植,靈濤細籟,時時間作,坐卧聽之,於瑩神濯襟,大有助焉。昔年曾以《松籟》署其文,海內鉛槧士知有方生諸子舊矣。茲又囊其續著若干首,題曰《聽松》,而印之居士。夫聲不即耳,耳不就聲,二無來往,聽機常寂。孟旋諸子入是三昧,宇宙雖廣,未足供其遊戲筆墨,何有于舉子業哉?時方生將辭諸子應試白下,感勝集之不常,欣會心之有托,請殺青《聽松》,以就正于同方者,而居士引其端。萬曆癸卯六月既望,真實居士時卧桂舟泊湖心三塔基荷花最勝處,晨起書。³⁸

37 馮夢禎:《序徐生選葩經程墨》,《快雪堂集》,卷3,頁89。

38 馮夢禎:《題聽松集》,同上,頁78。

方應祥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鄉試奪魁,故馮夢禎撰此序時仍為應舉士子而與同學諸子集文會於雲居精舍,其間先後編定課業稿《松籟》《聽松》二集。據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記載,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方生應祥,字孟旋,來,餉文稿一冊,玩數首,大有意致,不忝馮先生門下”,³⁹此處所謂文稿一冊或即《松籟集》。《日記》亦載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早晴,午後風報,南天有雨。是日,為方孟旋題《聽松集》”。⁴⁰在上舉多篇序文中,也有“面懇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以及“示余從子永年十義,乞評數語”等請文乞序之語,側面反映出萬曆年間士子課業編寫風潮之盛。馮夢禎在《序吳養之時義》一文中,有着更具代表性的表述:

近時諸生刻時義者,必索序真實居士。居士亦時時漫應之,然由衷之言,十不能一二耳。陽羨吳生彥淳,字養之,以今歲之春,介倪博士書稱贊居士,遂讀書雲居山中,數挾所業進,進必加親,而業亦日高妙。居士亟稱之,曰:“如子刻文,吾當作序。”而汪生亮明者聞之,亟索其文如干首登之,刻乞言之書十數至,而居士始一酬之。居士之不輕於言以為吳生重者如此。吳生之文,破庸俗關矣,何時破玄妙關耶?吳生其勉進之。居士舌在,豈惜百千妙偈為吳生稱揚讚歎也?一笑。⁴¹

吳彥淳刻文請馮夢禎評定,夢禎則撰序以勸學勉進。在晚明文權日趨於下的大形勢下,士子通過刻文請序,在鑽研時藝的同時也希望得到褒揚與提攜,並借助名家的影響力獲取認同感。值得注意的是,被馮夢禎稱讚文章“大有意致”的方應祥,在萬曆中後期亦頗負文名,在上引《青來閣初集》《青來閣二集》中即有如《兩生新藝叙》《叙徐孺子四書藝》《莊尚之北遊草引》等多篇為士子課業稿所撰序文,其中收入《明文海》的《莊尚之北遊草引》云:“尚之挾所為經生言,介吾友饒德成過我。讀其文,欣歎希有,相與微言再日夜,曛然沁映心目

39 馮夢禎撰,王啓元校注:《快雪堂日記校注》,卷11,頁200。

40 同上,卷14,頁298。

41 馮夢禎:《序吳養之時義》,《快雪堂集》,卷3,頁83。

間。已出一冊視予，曰：‘志將篋此爲燕之遊，先生其曷以命之？’”⁴²可看出方應祥已由昔日的請序者轉換爲此時的撰序者。

方應祥的例子也說明晚明士人刻文請序風潮之延續，伴隨著廣大應考士人群體締結文社、刻印社草課業，並請名家評點作序，社草序、課業序等這類序文獲得迅速發展，既成爲時文大家、制藝名家在非官方及民間藝文場域中顯示其評定權的載體，又展示出晚明不同階層士人在制藝文化影響下的生存狀態和交往模式。正是在這種時文選評去官方化過程中，以名家爲核心並由廣大科考士子通過刻文請序等行爲，共同構築起了一個圍繞制藝文化的關係網絡，這是我們觀察晚明士人思想與行爲的窗口。

四、制義自序與“自表生平祈嚮”

除上述名稿序、課業序兩種類型外，馮夢禎時文序的第三種類型是自序。晚明時期諸多的時文集自序，也是伴隨着時文創作、編集的普遍化而出現的，且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土人對科考制藝認同感的提升。馮夢禎在萬曆十七年撰寫的《皇明四書文紀序》中，就曾透露對制藝八股文的看法，並表明儘管自己已通過科舉獲取功名，但平日仍像應考士子一般苦心創作時文，而不以“敲門磚”拋棄之：“廷堅與余素以筆研相礪切，至彼此遇合，各修其業不衰，課子授徒，與經生無異，不以敲門磚棄之。而當其執管時，嘔心凝神，務求作者之意，以適於甘苦疾徐之節，神情寧厚，聲態寧薄，要以不愧先輩典刑而止。”⁴³上引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一日日記亦載“午前校《文選》，作《葛萬悅經義序》，又作經義二首”，亦爲一例。隆慶、萬曆以來，此種士大夫重拾“舊業”之風頗爲興盛，故而催生了“宦稿”這一時文集類型。⁴⁴

關於晚明士大夫通過創作、自編、自序時文而展示出對時藝這一“故業”的

42 方應祥：《莊尚之北遊草引》，《青萊閣二集》，卷1，《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78，頁398。

43 馮夢禎：《皇明四書文紀序》，《快雪堂集》，卷3，頁88。

44 艾南英《蔡太尊課兒草序》云：“宦稿之盛，莫盛於隆、萬士大夫。”見艾南英：《天慵子集》，卷13，《明別集叢刊》，第五輯，冊39，頁183。

某種留戀，⁴⁵馮夢禎的制義自序提供了一定的解釋，他自題時文集《剩技》說：“或以友朋訓答，機觸情生，宿習忽現，不覺淋漓滿紙，殊自喜，不忍棄擲。”⁴⁶馮氏又為萬曆十六年的自編時文稿《旬日聽雨草》自題序說：

今春多雨，晴者此月中旬數日耳。十九夜復雨，嗣茲連雨，幸無事，日造家塾，課兒曹作經義，遂動少年技癢，點筆戲為之，浹旬得十九首，而雨亦止。迫掃墓期，且返樵李，遂授友人吳生傳之木，附舊作一，志余之戲，題曰《旬日聽雨草》，志其時也。余髮種種，而青氈舊障不衰，蓋習心之難忘如此。余且志余過，豈敢與操觚之士爭道乎？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自題。⁴⁷

馮夢禎雖自稱是因“少年技癢”“習心難忘”而戲為之作，但實際上頗感得意而珍視之，刻印後寄給了四方之友人、士子。如《與趙少虹》“近刻《聽雨草》謹奉二帙，又《門人稿》一部，請正大雅，且以為候”，⁴⁸《與馬慎卿門生》則云“僕近頗以舉子業教授鄉里，春初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亦寄四冊，以博一笑。儻可式士，祈為刊行之”。⁴⁹在給國子監博士張惟方（字崇仁，萬曆十一年進士）的信中也叮囑可將《聽雨草》作為習文範本向監中士子推薦：“遠近士子以不佞舉子業稱名家，日有數輩執業就正，賴此以破寂寞。近亦遊戲為此，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今寄一帙。監中士子有志者，幸出示之，以端其趨，何如？”⁵⁰據此可管窺晚明時文選本編輯和流通的一些情形。

這種時文選本的編刊之風也助推了自題時文序這一序文類型的發展，除了自編自序這種較為常見的類型外，尚有“他編”自題序者，例如董其昌就曾為

45 “故業”一說見湯賓尹《陳鳴周制義序》：“去余為諸生十餘年，見人談故業，涎流於頰。”見湯賓尹：《睡庵稿》，卷3，《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63，第58頁。

46 馮夢禎：《題剩技序》，《快雪堂集》，卷3，頁90。

47 馮夢禎：《題旬日聽雨草》，同上，頁75。

48 馮夢禎：《與趙少虹》，同上，卷32，頁456。

49 馮夢禎：《與馬慎卿門生》，同上，頁459。

50 馮夢禎：《與國子監丞張崇仁》，同上，卷43，頁627。

他的時文稿《戲鴻堂稿》撰寫自序。《戲鴻堂稿》為其好友趙光祿所編，光祿弱冠習舉子業時，董其昌曾將自己從曹洞禪理中領悟到的作文訣竅傳授給他，故此後光祿廣搜董其昌舊稿並編訂成書，請董其昌題序。董其昌撰《戲鴻堂稿自序》(題下原注：即《復趙公益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毗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乃知往時著撰，徒費年月。當是時，第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亦從此敝帚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安，客每持余稿相質，無弗贗者。而里中有《訂贗錄》，贗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乃爾。不謂足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足下并破此窠臼。⁵¹

面對趙光祿的編集與請序，董其昌的第一反應或許就如文中所說的“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但為應趙氏之請，董其昌採取了將序“集”轉為序“事”的書寫策略，即把行文重點落在了結識趙光祿以及授予其文法等事上，其中一併敘述了少時在莫方伯家塾讀書習文，以及在萬曆十四年(1586)讀《曹洞語錄》而領悟為文訣竅等個人的習文應舉歷程。這種自叙平生習文經歷，實際上是晚明以來自題時文序的一大主題，並一直延續至清代。如明末魏學洵《魏子敬遺集》卷二“時藝贈送類”即有《制義自序》，詳述其自幼習文以及多年應考的“甘苦備嘗”之路。此外，清人戴名世有《意園制義自序》一文，前引王芑孫《制義自序》指出自編時文正是“以其嘗耗日力於此”，“又以世宿其業，流傳之有緒也，聊欲稍存一二以貽後之君子”，強調這一行為的自叙平生之功能和意義：

51 董其昌：《戲鴻堂稿自序》，《容臺集》，卷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71，頁291。

“山人始欲取其所謂十許義者，別爲一編，以自表其生平祈嚮之所存。”⁵²

王芑孫所說的“自表其生平祈嚮之所存”，可以說是晚明以來諸多時文自編自序的初衷之一。對於如上文所引董其昌這樣的文章名家，自可藉助這種形式講述昔日習文心得、仕進歷程；而對於更廣大的困頓場屋或仕途多舛的士子群體來說，自題時文序便成了他們自述科場甘苦的文類載體。晚明另一位嘉興文人且曾得馮夢禎稱賞的趙維寰，便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

與馮夢禎這樣的大家巨匠相比，趙維寰或許只能算是一位久困科場的小人物。趙維寰（1563—1644），字無聲，號雪廬，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自萬曆十年（1582）即“以儒生試浙闈，六試而選於里，又一試而舉於鄉”，⁵³在經歷多次鄉試不售後，始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考中順天府鄉試解元，並因此名動海內，但隨即遭遇創科舉史先例的“舉人罰科”，⁵⁴兩不上春官。自萬曆三十一年起又連上公車而不利。到了天啓年間，才任海寧縣教諭。

對於長年耗日力於制舉的經歷，趙維寰將其中的踐行、期盼都融入了《庸言》初集至五集、《麟集》等自編時文集，以及《庸言二集自叙》《庸言三集自叙》《題五集》《題麟集》等相對應的時文序中。如撰寫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的《庸言三集自叙》，回憶了自二十八年庚子被罰停科以來的經歷：

余自庚子來，七年病，三年報，兩不上於春官，亦不親制舉義。或二三門人問業，不得已強捉筆，年可十數首，非余好也。好事者索梓之。余曰：吾向有稿，曰《質言》，曰《易言》，曰《迷言》，曰《止言》，言行而獲罪，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已復深惟：質，少文也，易，無責也，迷則歧，止則亢，是宜有罪。向者吾師署余語爲“庸言”，庸，平常也，庶幾幸無罪與？嗣是凡有集，不別署名，而第分先後爲次第。先是，癸卯客清源，梓《初

52 王芑孫：《制義自序》，《惕甫未定稿》，卷2，頁282。

53 趙維寰：《題麟集》，《雪廬焚餘稿》，卷1，《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88，頁394。

5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四“順天解元”條載：“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趙維寰，浙江湖人，以文體被參，禮部復試，罰科。舉人之有罰科，自此始。”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73。

集》；丙午客焦山，梓《二集》。頃挾策北遊，攜兒子至吳門，會溽暑不前，休舍劍池之西隅。時散髮長林之下，或青嘯巨石之上，興到拈題，呼兒與商。凡三月，積文餘二十首。大火既西，舟子促發，乃檢午、未間篋中之存者合成帙，是為《三集》。蓋將懸諸國門，以俟夫知我者。⁵⁵

在遭到罰科後，趙維寰頗感一蹶不振，幾欲棄置舉業，自萬曆三十一年始重振精神，先後編刻時文稿《庸言初集》《庸言二集》。刻《庸言三集》時已重新燃起科場中式、“俟夫知我者”的期望。但之後仍接連失敗，故又有《庸言四集》《庸言五集》之刻，撰於天啓元年(1621)的《題五集》說：

余自壬寅迄辛亥，梓《庸言》凡四。辛亥後，絕不漏一語入行卷，蓋痛恨浮名掩實。一病十年，惟是物為崇。故將滅其跡，禳之也。……余自壬午來，垂四十年，屢起屢躓，其寄雌黃於人吻也，亦既熟嘗之矣。時辛酉除夕，題於普恩僧舍之西隅。⁵⁶

為再上春官，年近六旬的趙維寰仍居留於北京普恩寺中，數年來心力交瘁，幾至嘔絕。

天啓二年，趙維寰再次參加會試，於場前邸舍寫下時文集自序《題麟集》，意指此役為畢生的最終一搏：

憶余生癸亥，迄今甲子既週，六十翁矣。自壬午以儒生試浙闈，六試而選於里，又一試而舉於鄉，辛丑來公車又凡七上，蓋搢搢此道者四十年。除再丁艱、一掛議，實坐斗室中踟躕偃僂者，計畫凡三十四，夜凡六十八，往返長安道上計程逾五萬八千里。即鐵漢乎，恐精魄不能無銷亡也。年來闈事，雖亦勉強支持，每延及中宵，孤燈熒熒然，不禁目之眯而兩耳隆隆作雷鳴也。過此乙丑，是為六十三，將弄孫曝背，猶虞日不假，更能從事

55 趙維寰：《庸言三集自叙》，《雪廬焚餘稿》，卷1，頁393。

56 趙維寰：《題五集》，同上，頁393—394。

鞍馬。謂五萬八千里未足，更益之七千；三十四晝、六十八宵之偃僕未足，更益以六七宵晝乎？則是役也，毋論售與不售，是余舉子業獲麟之日也。因署其端曰“麟集”。時壬戌三月朔旦，題於場前邸舍。⁵⁷

《題麟集》這篇時文序既是趙維寰科場的絕筆文，又可以說是他數十年事舉子業的回憶錄。在晚明科舉制負荷越來越沉重的大情勢下，趙維寰這樣久困於場屋之人自然不在少數，時文集自編、自序等形式在晚明的流行，一定程度上為士子及文人群體提供了“自表生平”的載體，如前文提到的姚希孟《嚮玉集》同樣收有《南遊草自叙》《行卷自序》《小題閨集自叙》《王子鄉墨自序》《蠹餘篇自序》等多篇時文集自序，以記錄其不同人生階段的“一時之苦心”。⁵⁸ 而從文體發展的角度來說，制義自序這一類型的出現也使得時文序的記敘功能獲得強化，隨着萬曆以來這種以紀事、存文為功能的文類不斷膨脹，時文序是否入集成為清人在文集編纂中展開反思的一個話題。

五、餘 論

上文提及乾嘉時期文人王芑孫對時文序入集持有較為寬容的態度，且肯定自編自序時文具備“自表其生平祈嚮之所存”的功能。王氏評法式善《曹景堂制藝序》一文，也說：“時文序入集，誠自可厭。近流中頗有言時文序不必作，不必存者。其陳義雖高，然此一物者，亦已萃四五百年人精神材力於其中，且有甘心不第以名其業，而槁項以死者，豈能無作，又烏得存乎？但語有可存，則存之矣。”⁵⁹ 仍從存其文、傳其業的角度賦予時文序撰寫與入集的合理性。但正如他所說時文序入集在此際已多遭時人反對，隨着晚明時文序創作的風潮瀰漫至清代，清人開始圍繞時文序入集展開反思和批判，這一點與清人看待壽序這

57 趙維寰：《題麟集》，同上，頁394—395。

58 姚希孟：《蠹餘篇自序》，《嚮玉集》，卷1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78，頁596。

59 法式善：《曹景堂制藝序》末附王芑孫評語，《存素堂文集》，卷3，《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35，頁350。

一因明代祝壽習俗而發展興盛的文體，有諸多相似之處。⁶⁰ 如《鶴徵錄》記載清初李良年曾輯選文章總集《皇清文緯》，錄其《文緯叙例》，“文體先後略如《文粹》例而去其冗繁，補其疏略”，“叙”類小注即云“凡時文序及上壽、賀婚諸叙不列”，⁶¹與前引《明文海》《文章辨體彙選》之選文立場不同。此外，在文人別集編纂方面，尤其自清中葉以後，像袁枚、陶澍、焦循等文人對此表露出更明確的態度。袁枚《小倉山房集·文集》二十八卷，其中僅有一篇時文序《胡勿匡時文序》，文後有袁枚“自記”曰：“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與《嚴侍讀壽序》俱破例而存之，亦不免蹈歸熙甫之陋習云。”⁶²將此所謂“陋習”指向明人歸有光。許喬林校定陶澍文集也指出：“喬林校錄是集，期於賅備無遺，惟壽序、時文序及幕府代擬之篇，未著於錄，固公之意也。”⁶³對於這種文集編纂不收時文序、壽序的態度，焦循的觀點提供了一種解釋，他在《鈔王築夫異香集序》中曾討論文集之編纂，指出集部文章中，“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至於後世文集中的尺牘、應酬之作，並非出於經史與九流詩賦，他說：

非此三者，為尺牘、為題名、為諸應酬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應酬之文，非不自許為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啓、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為關鍵之法，必為之可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⁶⁴

60 參看常方舟：《“壽序非古”與壽序之為古文——明清壽序文體芻議》，《斯文》第4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90—103。

61 李集、李富孫：《鶴徵錄》（清嘉慶十五年漾葭老屋刻本），卷7，頁5b。

62 袁枚：《胡勿匡時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28，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新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冊6，頁568。

63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首許喬林識語，《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29，頁5。

64 焦循：《鈔王築夫異香集序》，《雕菰集》，卷16，《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72，頁176。

焦循認為“集”為經史之雜及九流詩賦之變，後世諸如時文序、贈序、壽序等應酬諸作與此相去甚遠，故而不當入集。實際上也是一種以“非古”的文類價值觀否定時文序入集的態度。

從清人的反思中，不難看出，時文序與壽序在晚明皆經歷膨脹式的發展，影響了別集乃至文章總集的格局。如果說壽序之文是藉助明代祝壽文化而蔚為大觀的話，那麼時文序創作風潮則是伴隨著晚明制藝文化的發達而產生的，這其中既包括文人士子對科考時文的認識變化，也涉及圍繞時文創作、編刊、選評等文化活動，更重要的還有像焦循談到的功業與文章之流傳，是這種文類膨脹現象所折射的晚明士人的文化心理基礎。不可否認，此時期仍有諸多針對制藝的批評之聲以及棄置舉業而攻古文辭的抉擇，但也應看到，廣大士子文人群體對所謂“宿業”“故業”的慣習，乃至希望可藉某種形式流傳於世的期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晚明文化現象，也是我們重新審視晚明文學與士人思想生活的一個窗口。

（作者：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芑孫：《惕甫未定稿》，《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王煒：《明代八股文選家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方應祥：《青來閣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艾南英：《天慵子集》，《明別集叢刊》，第五輯，冊 39，合肥：黃山書社，2015 年。
- 本傑明·艾爾曼著，高遠致、夏麗麗譯：《晚期帝制中國的科學文化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年。
- 李光縉：《景璧集》，《明別集叢刊》，第四輯，冊 21。合肥：黃山書社，2015 年。
- 李集、李富孫：《鶴徵錄》。清嘉慶十五年漾菴老屋刻本。
-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吳之甲：《靜悱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75。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 周啓榮著，張志强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年。
-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姚希孟：《響玉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新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陳勳：《陳元凱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79。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 陶望齡撰，李富會編校：《陶望齡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黃宗羲纂輯，黃靈庚、慈波點校：《明文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 年。
- 商衍縈：《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年。

- 張思齊整理：《八股文總論八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葉向高：《蒼霞餘草》，《明別集叢刊》，第四輯，冊63。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
- 董其昌：《容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71。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焦循：《雕菰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馮夢禎：《快雪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64。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馮夢禎撰，王啓元校注：《快雪堂日記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湯賓尹：《睡庵稿》，《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6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湯顯祖：《湯若士先生點閱湯許二會元制義》。明萬曆間刻本。
- 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6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8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蔡清著，張吉昌、廖淵泉點校：《蔡文莊公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羅萬藻：《此觀堂集》，《明別集叢刊》，第五輯冊90。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
- 龔篤清、龔昊、烏媛編著：《八股文話》。長沙：岳麓書社，2020年。

二、論文

- 徐兆安：《“房稿”刊行的習慣與晚明時文評選風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5本第1分（2024年3月），頁113—161。
- 常方舟：《“壽序非古”與壽序之為古文——明清壽序文體芻議》，《斯文》第4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90—103。
- 張帆、陳文新：《論〈明文海〉中的八股文批評》，《人文論叢》2017年第2期，頁254—259。
- 張藝曦：《湯賓尹與晚明制藝八股文的流行及傳說》，《漢學研究》第40卷第1期（2022年3月），頁77—226。
- 龔宗傑：《集部視野下明代經義的文體建設及文章學意義》，《復旦學報》2021年第5期，頁117—125。

**A Dedicated Cause Endures Through the Ages: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and the Genre
Proliferation of Prefaces to Collections of
Eight-Legged Essays**

Gong Zongjie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From the Wanli period onwar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that coalesced around the composition, compilation, public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alongside scholarly social rituals such as literary coteries and ceremonial networking,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force shaping both the literary landscape and the intellectual ethos of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The prefatory texts accompanying the editorial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thologies of Eight-Legged Essays not only embody the adaptive respon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enre theory to literary cultural dynamics, but also emerged as a distinctive hallmark within the late Ming literary landscape. As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prefaces for collections of examination essays became more prevalent, these prefaces not only evolved into a formal category systemat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editorial frameworks of individual anthologies and comprehensive compendiums, but also extended their cultural influence through the prestige of renowned masters of Eight-Legged Essay during the late Ming era.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publication and preface composition gave rise to self-compiled anthologies and self-authored collections of

prefaces. This development endowed the prefaces to the Collection of Eight-Legged Essays with a narrative function of “self-narrativization of life trajectorie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m into textual repositories through which scholar-officials memorialized and documented their imperial examination careers.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propelled the generic proliferation of prefaces to Eight-Legged Essay anthologies from the late Ming onward, ultimately provoking Qing literati to critically interrogate the legitimacy of incorporating such prefaces into literary collections.

Keywords: Prefaces to the collection of Eight-Legged Essays, literary culture of Eight-Legged Essay, generic proliferation, Feng Mengzhen, Zhao Weihuan